

浅谈《沉沦》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接受

孙璐璐

摘要:郁达夫在“自觉承担民族救亡使命”的集体无意识的促使下,于作品集《沉沦》中,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广泛吸取西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的合理内核,使其创作成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典范。同时,在其对“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探讨中,令其作品具有深刻的现代性特征。

关键词:郁达夫,《沉沦》,精神分析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08)01-0135-02

作者简介:孙璐璐(1983-),女,辽宁葫芦岛人,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文学院200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7-05-07

中国现当代文学成长于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中,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为中国文人开启了对“个体生存自由”进行探索的大门。郁达夫以“血肉之躯”为新文学中小小说的发展破冰启航。1921年小说集《沉沦》的出版,宛如“乌云翳日下的一声霹雳”唱出了“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为那一代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重塑、精神家园的重寻开辟了新的途径。他是创造社的领军人物之一,但其并未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中,郁达夫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接受是多方面的,《沉沦》中最清晰可见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正如郁达夫所说:“文艺小说,大抵是以不顾环境,描写那些潜藏在人心深处恒久的倾向为主。”^[1]这“倾向者”即指人的本能欲望,这与精神分析学对欲望的肯定与重视是相一致的。同时他又说:“以写实为基础,更加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新味和殉情主义的情调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当然是价值最高。”^[2]的确如此,在《沉沦》中随处可见的是浪漫主义式的自我肯定、自然主义式的性欲描写、唯美主义式的颓废文风、精神分析学式的本能呈现……由此可见郁达夫对于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是整一的、绝非单一。毫无疑问,无论是哪种选择与接受,均是他基于自身、以及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生存本质的思考的结果,背后有中国文人的社会承担意识这一巨大而深广的集体无意识所支撑,从这一角度讲,他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一、浪漫而现代的“人”的肯定

郁达夫认为:艺术是“人生内部深藏的冲动”必须把“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时候价值最高”,“性欲和死是人生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作品更大”^[3]。据此“性的苦闷”与“死亡的归宿”是贯穿《沉沦》、《南行》、《银灰色的死》的总主题,而同时,这与精神分析学中某些文学观念有诸多相合之处。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指出:无意识是一种本能冲动(主要是性的本能),它毫无理性,处于大脑底层,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它为人所意识不到但却最能影响人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人的本质:利比多。故而,在肯定人的性欲要求合理性的基础上,郁达夫不但肯定“性”,更大胆地呈现本我、自我、超我斗争下主人公“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不但“再现作家自己生活和心境”,将“作家心境大胆暴露”,将“个人私生活中灵

与肉冲突以及变态心里”^[4]大胆呈现,更设计主人公走向死亡的结局,从而得出“人,生而痛苦”(叔本华语),“他人即是地狱”(萨特语)等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哲学命题。将其作品提升至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思考中,使其笔下的人物走入“现代主义文学”的殿堂。

“男女的白热的心肠”在似“浮萍”的“南迁”中“沉沦”,又在“银灰色”的梦中“死去”,这样的死亡直指当时中国的黑暗,其力度是巨大的。正如郭沫若在评《沉沦》时说到:“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5]“大胆反抗、对于自我充分的肯定”是浪漫主义文学传统。郁达夫创作现代性之一表现就在于对浪漫主义的接受的同时对其进行超越,他将视角对准“本我的本能欲望”不可实现性,从而得出了“生的困惑”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主题,故而,当作品中的主人公高声疾呼:“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啊,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钱,你若能赐给我一个伊甸园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的时候,所体现的不仅是大胆的呼喊,更是现代的要求!

在浪漫主义抒情情绪的促使下,郁达夫大胆的肯定人的本能,然而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对于性欲描写时,却呈现出了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二、自然而赤裸的“本我”呈现

弗洛伊德将人格看成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重结构组合而成。本我是人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本能,遵循实现生命的最基本原则,即“快乐原则”;它是人的潜意识的表现;自我,为使生命适应环境而得以生存就需考虑外部现实(即环境)或适应或成为环境主人,从社会获得所需要的一切;超我,即是道德标准,代表着理想而不是现实的东西,要努力达到的是完美而非快乐,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是“外部权威的内心化”遵循“至善原则”。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混合、相互转变,一旦失去平衡便引向精神病。

对于本我的肯定是《沉沦》展现的核心内容。而其性欲描写则是以类似于自然主义的细节刻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熏风日夜的吹来,草色渐渐儿的绿起来,旅馆近旁麦田里的麦穗,也一寸寸的长起来了,草木虫鱼都发育起来,他的从始祖

传来的苦闷也一日日的增长起来,他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也一次次的加起来了。”(《沉沦》)“W的肥胖的肉体,M的半开半闭的眼睛,散在枕上的她的头发,她的嘴唇和舌尖,她的那一种粉和汁的混合的香气,下体的颤动……他想到这里,已经不能耐了。”(《南迁》)

首先,作者肯定性欲要求的自然合理性。在一种向往自然,返朴归真的追求中,主人公沉醉于自然之美,性的苦闷像春风熏绿草,麦穗长成,草木虫鱼化育一样自然,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对人本能要求的肯定,这一肯定本身体现了作者尊重自然生命的发展规律。

其次,自然主义,是以真实的描写为目的,即以对客观外在的现实(包括社会现实)的真实描写及对人性、人的肌体的真实描写为目的。在表达主人公心理情绪时对细节真实的刻意追求,表明郁达夫对自然主义“写实”方法的接受,当然由于他持有“主情主义”的文学观,致使他没能像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直指社会黑暗现实,却不可否认地发现他将这“写实”的态度引入细节处理上,用触目惊心的笔调挑战传统、对抗黑暗。

诸多学者批评郁达夫小说不道德,其实并非如此,真正的文学是一种灵魂叙事,但身体是灵魂的载体,故而,真正的文学是以尊重身体感官的真实性为前提的,是忠实于身体的。然而身体并非仅是肉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是在肯定身体需要,而并非宣泄肉体欲望,因为他笔下的主人公从来没有放弃过身体叙事背后的伦理思考。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作家自身的伦理承担。

三、深远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超我”闪现

“王尔德说:从丑恶中发掘出美来,是艺术家的职分,所以我说,从兽性中去发掘人性,也是温柔敦厚的诗人之有。”¹⁸肉体欲望是动物的共性,而人的特性在于他有追求真善美的心灵,如果主人公完全按本我的欲望行动,那么他的人生不会有孤苦之感,不会有自责与忏悔之情,更不会最终走投无路退之则选择死亡。主人的超我从未放弃过思考,弗洛伊德认为,超我压制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行事,其由理想和良心两部分组成。

(一)良心的忏悔之苦

周作人称《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¹⁹。之所以是受戒的文学,是说它引发人的思考,含有使读者思想得到净化的目的性,在作品中首先体现在主人公的无尽忏悔中,主人公所留学的日本并不是思想禁锢,相反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开放而迷醉的,“私小说”的广泛盛行,是当时道德规范失灵的表征,然而令主人公心里不安的是他的“良心”。

无论是Y君、伊人、还是他,均是心地善良的青年人,他们热爱自然,都对大自然美好的事物有着无尽的向往,都会要从诗中找寻自己的梦,他会自言自语道:“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只有大自然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情人。”他们经常的自怜、自哀,又常含清泪,这样善良的人们却受限于本能欲望的引诱,在某中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生而痛苦。其实,当他“犯罪”之后,令他懊悔的并非“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伤害”的圣训,并非“封建纲常”的规范,倘若如此以主人公的性格他们早就会反复强调以使得读者所接受,他们在意的是有害于自己作为“自然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一种现代的健康观念,也体现了作者对生存着的人的现代性思考。而道德的规范,使得他深感自我行为的不道德,因为有备于自我“良心”观念,才产生了自责。

主人公爱诗,爱诗中美好的事物,主人公是向善的,伊人高扬“精神上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稣所受的苦也是精神

上的苦。”而当美与善遇到欲望之真时,主人公可以不自责,也可以偷窥后不忏悔,但深居于主人公生命中的集体无意识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它才是促进主人公痛苦的根本原因。

(二)人生希望的破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便代代相传的自觉的自我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讲,那是一种深广的集体无意识,中国文人讲究学以致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近者肉体欲望的冲动使得主人公有愧于父母,远者,立身救国之志无处可行,故而,他们虽生却也痛苦无比。报国无门才是零余者们选择死亡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认为《沉沦》的结尾“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有些牵强附会的倾向,实际上它的背后承载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民族心理和承担意识,然而,在作品中,主人公身上这种心理无从寄托,认识也无法实现,无疑他们的人生面临的只有失败。

因落后而求学西洋,因落后才受气东洋,在巨大的外界压力压制下的“我”同时受个人欲望的烤灼,故而,只能一点点的沉沦,一点点的忏悔又一点点的无力自拔,痛苦于“道德”的制约,更痛苦于报国的无门。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就是白日梦,“自我”是作品中的主角,现代小说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自我”分成许多个“部分自我”结果就使他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冲突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分别得到体现,把梦中的自由联想,与艺术的想像联系起来,强调表现无意识部分。无疑,作品中主人公的形象承担了作家的预期,尽管郁达夫曾一度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大旗,但也不能将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社会职责的古老的集体无意识屏除,他以文为武器进行干预生活的战斗。

然而,正如丁易在评价《沉沦》时指出:(郁达夫)“看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却不知道如何消除这黑暗;希望中国强大,却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²⁰因而坠入更苦闷的境地。这苦闷受制于超我本我双重压力下,自我的挣扎,而这自我的挣扎中有太多的颓废之色,这也是长久以来作品受人非议的原因之一。

四、唯美而颓废的“零余者”塑造

感伤的诗,醉人的酒,清冷的泪为郁达夫笔下世界添加了颓废的银灰色。郁达夫小说中没有理想化的英雄,没有才智超凡的巨人,只有被社会主流抛弃的“零余者”。生活在“银灰色”梦中的“零余者”是主人公本我、超我双重压力下被社会所抛弃的苦闷的“自我”。主人公徘徊彷徨,颓废感伤,越挣扎越沉沦,最终走向死亡,似乎这些“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的命运中注定了死亡,这近似宿命论的结局。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颓废的色彩。

颓废(decadence)是西方十九世纪末文学的情感底色,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唯美主义文学是对“颓废”的最高解读,表现在对哀愁痛苦的描写、感官享乐的崇拜,追求怪异,热衷于从恶中寻找畸形、病态的美。“作为十九世纪初风行于欧美的唯美主义,上承浪漫主义下启现代主义,本身与早期象征主义、颓废主义等概念呈现交叉的情形。”²¹唯美主义的核心是颓废,郁达夫对其则是怀着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和反封建的决心来接受颓废的。或者说,郁达夫小说并非颓废,而是以一种颓废的色彩浸染作品,使作品反

(下转第151页)

叛战争中必然是观望不前,不肯力战。李吉甫说:“中兴三十年二兵未戢着,将帅养寇藩身也”。(《新唐书》卷一三六《张伯仪传》)可谓洞察其中就里。

最后,唐朝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争的严重干扰和牵制,也是不能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肃代之际,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及皇权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曾大大影响到唐廷对安史旧将的处置,并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如当史朝义邺城败退时,唐朝用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仆固锡父子为大将,率兵追击,怀恩父子和唐朝朝廷间有矛盾,为了养寇固位,接受了安史部下许多大将的投降,并且,表请这些降将就地担任本处的节度使,也就是将安史旧部的残余力量都保存了下来。而且在德宗时期还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等军完全交与宦官主管。《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说:

“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军。以文昌、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

此外,中枢政局内部的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所谓“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政治角逐对讨叛战争的恶劣影响。元和以后,牛李两党勾心斗角、南衙与北司相为水火,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化、激烈化。唐廷已经为这种无休止的纷争弄得精疲力尽,自顾不暇,根本谈不上消灭河北藩镇。文宗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从侧面说明了党争对藩镇割据的影响。

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连年战争,使人民横遭兵祸,生产受到破坏,兵祸赋役也日益繁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各地节度使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更是增兵冲饷不止,加剧了统治阶级同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到宪宗时,唐朝改行两税法,财政收入增加,“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杜佑《通典》卷六《赋税下》)并且由于一再整顿漕运,通过运河从江淮转运了大批钱财,唐朝中央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打平藩镇的物质条件,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略有改革,贯彻了打平藩镇反抗的政策,因而先后平定了四川的刘辟,浙西的李崎,淮西的吴元济,淄青的李师道;就是河北三镇也展示归顺,藩镇嚣张割据的气势暂时敛迹。此后中央与藩镇间的斗争从未停止,直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才开始扭转藩镇跋扈的局面。北宋在后周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接触藩帅兵权,并施行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的措施,藩镇割据的局面才最终结束。

参考文献:

- [1]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2]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3] 张国刚.试论唐代藩镇的类型划分与动乱特点[A].研究生论文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 [4] 乌廷玉.隋唐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 [5]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6] 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7] 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8] 张仁忠.中国古代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上接第136页)

封建的意味更能引发人的深思。

他的颓废是有青春色调的,更多的是书写青春期的忧郁与感伤,颓废的核心是在内在希望的表层涂上一层绝望,是绝望与希望的复合。正如《银灰色的死》这一题目本身,中心词固然是“死”,而“银灰色”增加了死的感伤,“灰”是颓废的颜色,让人眼睛混浊,让人感到死的悲琐,为什么是银灰色呢?银色是冷色调的,是衬托出死的寂寥,与金色的炽热相比更符合主人公的苦恼之感,银色更是梦的颜色,理想的颜色,闪着耀眼的光,象征着希望、梦想。那么《银灰色的死》既是理想之死,抱负之死。表面上郁达夫是将绝望进行到底,实际上则是将希望留给读者,以引发读者的发奋与建构。

颓废是郁达夫小说的外表,而以近乎绝望的希望,唤醒整个民族崛起的希望才是郁达夫创作的根本目的。

综上,本我、自我、超我的永恒争斗是人生存的本质,亦是郁达夫《沉沦》中主人公一致的生存状态,他们承载了作家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现在的小说……表现人生,务须拿住人生最重要的处所,描写苦闷专在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重大的苦闷。”¹⁹对于性的苦闷的呈现,体现了郁达夫肯定人、尊重人性的现代思维,对于人“生的苦闷”的呈现则体现了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社会职责时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可以说郁达夫的小说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

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现代的文学观念吸收的基础上,郁达夫广泛汲取西方文学思潮的营养,以其浪漫主义大胆的自我肯定,自然主义直白的欲望展示,唯美主义颓废文风的设置,与知识分子的自觉承担意识相交织,最终使《沉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抒情小说,进而进入到“现代生存困境”的哲学思考中,是有着深广的现代性意义的。这样看来,郁达夫确是现代中国小说史的一座山峰。

参考文献:

- [1][2] 郁达夫.文学概说[A].郁达夫文集(第五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86,85.
- [3] 郁达夫.文艺鉴赏上的偏爱价值[A].郁达夫文集(第五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75.
-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3.
- [5] 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1):10.
- [6] 郁达夫.从兽性中发掘人性[A].郁达夫文集(第七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96.
- [7] 钟叔河.知堂书话(下)[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860.
- [8] 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34.
- [9] 解志熙.美的偏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37.